

论鲁迅的“立人”伦理观：以小说《故乡》为例

Lu Xun's Ethics of Cultivating People : A Case Studies of *Hometown*

朱文斌 (Zhu Wenbin) 岳寒飞 (Yue Hanfei)

内容提要：睁眼看世界的鲁迅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以启蒙为己任，试图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的目的。鲁迅的“立人”伦理观具体表现为“幼者本位”、“弱者本位”、“生存本位”和“独立本位”。小说《故乡》充分体现了鲁迅的“立人”伦理观，关于少年闰土的回忆以及水生与宏儿的描写体现了“幼者本位”的思想；关于麻木的中年闰土形象塑造则体现了“弱者本位”的思想；关于瘦骨嶙峋的杨二嫂行为表现则体现了“生存本位”的思想；而满怀忧患意识的“我”则在思考“独立本位”的问题。“立人”伦理观与启蒙思想相结合，彰显了鲁迅“兼济天下、强国救民”的伦理思想。

关键词：鲁迅；《故乡》；立人；伦理观

作者简介：朱文斌，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稽山杰出学者，主要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岳寒飞，浙江大学中文系，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世界华文文学。

Title: Lu Xun's Ethics of Cultivating People : A Case Studies of *Hometown*

Abstract: Lu Xun, taking enlightenment as his duty, tried his bes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founding country” by “cultivating people.” Lu Xun's ethics of cultivating people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standard of the young,” “the standard of the weak,” “the standard of survival” and “the standard of independence.” The novel *Hometown* fully embodies Lu Xun's ethics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e memories of the young boy Runtu and the description of Shuisheng and Honger embody the thought of “the standard of the young.” The image of the numb middle-age Runtu reflects the thought of “the standard of the weak.” The behavior of the bony auntie Yang embodies the thought of “the standard of survival.”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question of “the standard of independence” with a sense of anxiet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thics of cultivating people and th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highlight Lu Xun's ethics of “caring for the world and strengthening country as well as saving people.”

Key words: Lu Xun; *Hometown*; cultivating people; ethics

Authors: **Zhu Wenbin**, Ph.D., is Distinguished Scholar of JiShan, and Professor of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00, China). He mainly engages in the study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365214095@qq.com); **Yue Hanfei**, Ph.D student i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She majors i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mail: yuehanfei2018@163.com).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坦白其作小说意在“为人生”，并且希冀用小说“改良人生”，这种“爱人”、“为人”、“立人”的情感与五四时期所张扬的理性启蒙精神相结合，贯通连接着鲁迅文学创作的始末。这是睁眼看世界的鲁迅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以启蒙为己任，试图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目的的一种尝试。本文以《故乡》为研究范例，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对鲁迅的“立人”伦理观及其文学表达进行文学伦理学阐释。因为正如聂珍钊所指出的：

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伦理学批评的对象，主要在于文学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类社会虚拟化，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具有了伦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内容。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它通过艺术环境为伦理学批评提供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和生活空间，通过艺术形象提供更为典型的道德事实，并通过文学中的艺术世界提供研究不同种族、民族、阶级、个人和时代的行为类型的范例。（《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18）

利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我们可以从鲁迅在小说《故乡》中所塑造的几个人物如水生、宏儿、闰土、杨二嫂、“我”等身上，着手解读其文学世界和“立人”伦理观，具体呈现为以下四个层面：少年闰土的回忆及水生与宏儿的描写体现了“幼者本位”的思想，中年闰土形象塑造体现了“弱者本位”的思想，杨二嫂的形象塑造体现了“生存本位”的思想，满怀忧患意识的“我”的形象塑造则体现了“独立本位”的思想。

一、“幼者本位”思想

早年鲁迅曾受赫胥黎、达尔文、黑格尔等人的进化学说影响颇深，从生物及人类的进化史中，他感受到后起之辈身上蕴藏着强大的、进步的、革新的力量，而这种蕴含历史规律性的推陈出新和发展进步不仅是顺势而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更是迫切之举。鲁迅认为“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鲁迅全集》第一卷 141），然而旧垒中的老中国儿女们精神上的封建枷锁已不可破，只

有寄希望于孩子、青年、学生等还未受尽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毒杀的少年一代，因此他说“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第一卷 137）。鲁迅屡屡苦口婆心地奉劝人们“救救孩子”，让孩子成长为健全的、自由的、独立的人，进而才有望达成“人立而后凡事举”（第一卷 58）的社会理想。

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在常常借助美化的笔触构造幼者形象来进行表达，在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不乏至纯至真的孩童形象。《故乡》中的少年闰土即是一位茁壮有力、见多识广、充满童稚的幼者：“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第一卷 503）。围绕着少年闰土所展开的诸如瓜地捉獾、雪地捕鸟、海边拾贝壳等无穷无尽的稀奇之事的叙述，无一不显露出“我”对于少年闰土的喜爱。以至于本是满怀期待回乡的“我”在遭遇了现实乡村萧索闭塞的打击之后，竟然在回忆少年闰土中“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第一卷 504），这背后其实是鲁迅对于幼者之爱的情感流露。

为了突显“幼者本位”思想的重要性，鲁迅巧用正反对比的方式来表现封建社会对于幼者成长的戕害和麻醉。我们不妨将少年闰土的成长环境概括为一个广阔的自然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孩童的天性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自在发展，在与自然万物的交流相处中获得身心的健康成长。而与少年闰土年龄相仿的“我”以及和“我”一样被管制、教育和训诫的少年们则丧失了自在成长的权利和快乐，当“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天空”（第一卷 504）。童年于“我”来说是被成年人所阉割的，所以当“我”结识了一个来自农家的鲜活自在的少年闰土时才会觉得分外新奇与羡慕。

少年闰土的意外到来激活了作为一个儿童的“我”对于自由、自然、游戏等本应属于所有人类童年的生活体验的渴望与憧憬，这是幼者的一种正常心理反应和成长诉求。但是在中国封建家庭制度里，本位不在幼者，而在长者身上。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孝道的头等要义便是幼者要依顺长者，不可忤逆、触犯长辈，这种道德观念制约着儿童生理以及心理的健全发展，同时也造成幼者表达自我真实情感和诉求的合理性的丧失，催生的只能是听话的、顺从的、寄生在长者身上的集体无意识的孝子贤孙。

鲁迅曾以父子关系为例痛斥了封建家庭制度下扭曲的亲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第一卷 137），这其实揭示了封建家庭伦常中长者与幼者之间丧失了天然的亲子之爱，而异化成一种交换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现象。事实上，健康合理的父母之爱应该是出于天性的纯粹之爱，而非出于一种以施恩与报恩的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中，鲁迅认为“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第一卷 140），他还认为中国家庭不妨借鉴欧美及日

本家庭的方法，多以幼者为本位去营造有利于幼者成长的环境。

作为封建家长制度的捍卫者和受益人，长者一方面因袭了传统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的旧习，另一方面也存在改造的可能，这是因为血缘纽带缔结的天然关系中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爱的因子，尽管这种爱的方式和观念可能不尽合理。例如闰土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底层忙月，但却十分疼爱闰土，“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第一卷 503），这份夹杂着封建迷信成分的质朴父爱即是一例。鲁迅由此提出了对于长者的要求：“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第一卷 137）。

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一方面可以说是其拿来主义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也是其深谙旧中国之腐朽、衰败、自大，旧中国子民的愚昧而不自知、落后而不思进取、奴性劣根之难以更变的残酷现实，进而求诸于培养和教育新一代，创建真正的文明的人的国度的自觉尝试。虽然中年闰土与中年的“我”之间的隔膜和生分已经不可避免，且两人业已没有重归于好的可能，但是作为新一代的宏儿和水生却是未来的希望。鲁迅不禁借“我”之口为代表着未来的孩童祈祷“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第一卷 510），鲁迅在这一对无邪童伴的身上寄予了他对于幼者深切的关怀和保护。

二、“弱者本位”思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写农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人是鲁迅，鲁迅笔下的这两类作品无论是在叙事技巧和表现手法上，还是在内涵拓展和思想深刻性上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抛开大多批评者所常谈的对于鲁迅笔下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形象的批判、针砭、挞伐以及其“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愤愤态度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对于乡土农民悲苦命运的书写，还是对于积贫积弱的知识分子的描摹，无不流露出鲁迅对于生活在贫弱中国大地上的弱者们的悲悯情怀和关切之爱。鲁迅终其一生都不减其对于苦难大众的关怀，尽管这其中夹杂了既爱且恨的复杂情感，但这恰恰印证了鲁迅所长久持守的“弱者本位”思想。

中年闰土即是一位历经沧桑、无力反抗的贫弱者，鲁迅在极其简练的篇幅里对中年闰土凄苦、悲凉、窘迫的生存状态进行细腻点睛式的描写。鲁迅对于中年闰土贫弱形象的塑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其肉体上的劳损，二是其经济物质上的匮乏，三是其精神世界的萎缩颓丧。

首先，中年闰土在肉体上饱受劳损与消耗。相较于那个鲜活的充满生气的少年英雄形象，中年闰土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

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第一卷 506-07）。这一段外貌描写不仅勾勒出中年闰土饱经沧桑的形象，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其生存不易的现实处境。事实上，鲁迅笔下的中年闰土何尝不是千千万万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劳苦农民的形象代言呢！

其次，中年闰土在经济物质生活上极度困乏与贫瘠。“我”返归故乡的时节已是深冬，而闰土是海边种地的农民，他所生活劳作的环境更加寒冷潮湿，但是他的“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第一卷 507）。当“我”询问闰土的景况时，他摇头答道：“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第一卷 508）可见闰土一家人的基本温饱都已难以为继。

鲁迅在小说里总结了造成中年闰土一家劳无所得的多重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第一卷 508）。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提倡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以至于像中年闰土这样一个食不果腹的贫苦农民仍坚持因循守旧，不顾实际地盲目生子。另一方面，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各式各样趁机敛财的官匪们纷纷出马，变本加厉地压榨盘剥处在社会最底端的弱势群体，将中年闰土们及其家人推向更黑暗惨绝的深渊。

最后，中年闰土在精神层面上陷入了萎靡与颓丧。一声“老爷”不仅宣告了闰土与“我”之间早已隔着一层厚厚的障壁，同时也昭示了中年闰土精神世界的塌陷，这背后是封建等级思想在作祟，是奴隶根性的延衍。当母亲试图拉近闰土与“我”的关系时，反而得到了“啊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第一卷 507-08）的回答。不仅如此，业已被封建思想所浸染的闰土也势将把这一枷锁遗传给他的子孙，“水生，给老爷磕头”（第一卷 507）这一句便是预兆。

鲁迅认为要振兴民族，“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第一卷 58），而在当时作为组成民族、国家、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的“人”却是积贫积弱的，民众中的大多数都是受欺压受盘剥的弱小者。在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蚕食下，长久饱食困苦的弱小者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终归只能是“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第一卷 227），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在困顿与被宰割的艰险环境中苟活求生。无论是闰土、杨二嫂、祥林嫂、爱姑、阿 Q，还是孔乙己、涓生、魏连殳、吕纬甫等，都是在社会中遭受苦难与不济的、不能把握个人命运的弱势者。在自由、平等、文明缺失的国家，弱者面对暴君和他的暴政的反映也只能像中年闰土一样“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来，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第一卷 508）。如是，沉默的国民便诞生了，沉默的民族也随即诞生。

以往论者们多以“战将”来评价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身份地位，这

是因为鲁迅对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封建道德等的口诛笔伐最犀利最强劲。鲁迅作文不留情面，将人性的丑陋、愚昧、懦弱等阴暗面赤裸地公诸于众，其言辞如投枪匕首一般能够达到致批判对象于死地的效果，故此鲁迅也得到不少批评，如“鲁迅好骂人”等评价，这实际上是误读了鲁迅。其实，我们应该本着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读鲁迅，不仅要看到鲁迅在文学领域中的锋利与冷峻，更要看到他试图以文学为信仰来改造国民精神，进而促进民族觉醒，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终极目的。

正是出于对苦难贫弱者深厚的同情与博爱，鲁迅的文字更见深刻与震撼。就像《故乡》中对于闰土的悲苦不止浮于静态的描摹，而是道出了故人的颓变带给“我”极大的痛苦：“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第一卷 510）。因为心存对弱者群体的关爱、理解与体恤，使得鲁迅对于小人物的苦难书写不仅篇幅多而且用情深。鲁迅不仅以“弱者本位”思想去体恤弱小者非人的生存处境，而且从这一视角出发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分析，进而对症下药，奋起刨除坏掉的祖坟，创建第三样时代。

三、“生存本位”思想

如果说鲁迅对于像少年闰土、水生、宏儿等幼者的态度是充满疼爱与怜惜的，对于中年闰土这类只知道苦却说不出来的贫弱者的态度是悲悯与同情的，那么对于杨二嫂这样巧言利嘴、满怀算计、自私自利，同时又极具求生欲之辈的态度则是愕然和惶恐的。因为杨二嫂这类人不似中年闰土那样心甘情愿地沦落为沉默的、任人宰割的、无声承受一切苦难的羔羊，而是具有投机取巧的智慧，懂得阿谀奉承权贵，贬低嘲讽比自己地位更低者，见缝插针地从别人那里捞取利益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自私者。

伴随着杨二嫂出场的是她尖利的怪叫声，而“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第一卷 505）则是其人体素描像。鲁迅几笔勾勒出一个精瘦泼辣的中年杨二嫂形象，对其语言的描写则更直接地凸显了她的巧言花语：“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第一卷 505）是人来熟的客套话，其中并不见得含带多少亲近与热情的成分；“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第一卷 506）则印证了其冷热态度转换之快，“贵人”一词颇有嘲笑讽刺之意。

杨二嫂登门拜访的意图当然不只是停留在嘘寒问暖、拜访邻友的层面，而是为了获取实际的收益，即搜检家用物品。“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吧。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第一卷 506）。这不仅道出了其此行的用意，而且以一种一面抬高别人，一面贬低自己的方法，使得原本无来由的洗劫变成了似乎合情合理的、让人难以回绝的

乐善好施之事。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门户等级之分由来已久，而且提倡富裕之人接济弱者，也即“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杨二嫂巧用门户等级的观念，将家道已破落的“我”抬举到一个与“我”实际景况不符的位置，然后用自我贬低的方式诉苦求助，对“我”施加了道德上的压力。

当听到“我”坦白自己并不阔绰时，杨二嫂便以一种八面玲珑的智慧堵截了“我”的回绝。“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第一卷 506）这种夸张的口吻让“我”只好闭口缴械，然而即使如此，杨二嫂仍不减她耀武扬威的气势：“阿呀阿呀，真实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第一卷 506）可以说，杨二嫂是一位表面打着贫苦和弱小的求助旗帜，实际却做着光明正大的强盗买卖的投机者。“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第一卷 506），就昭著了杨二嫂的洗劫行径。

不仅如此，为了给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杨二嫂不仅巧妙地运用门户等级、道德心、乐善好施等传统观念去强迫“我”不得不默许她的洗劫；而且还懂得诬赖比她更贫弱者，以此美化和完善自己的洗劫行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了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第一卷 509）。正如有学者论，艰辛的生活“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王富仁 29）。

虽然，鲁迅在《故乡》中将杨二嫂刻画成一个不敢让人恭维的刻薄妇人形象，但是在行文落墨中，鲁迅并没有采用一些带有批判、讽刺、甚至是厌恶的词汇来表达“我”对杨二嫂的情感态度，而是选择用“吃了一吓”、“愕然”、“愈加愕然”、“惶恐”以及“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第一卷 506-07）等词句来表述“我”与杨二嫂对话时的心理情绪。这实际上体现了鲁迅的“生存本位”的思想，鲁迅是站在一种以生存为本的立场上来看待杨二嫂们的所言所行。虽然杨二嫂对“我”造成了“伦理困境”（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但是“我”对她也实在无从恨起。

杨二嫂年轻时颇具姿色，俨然是一位美貌静谧的妇道家：“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第一卷 505），而且从杨二嫂裹小脚的现实来看，说明她是受过一定程度的传统女德教育。但时过境迁，原本貌美贤淑的“豆腐西施”已经年老色衰，不得不靠着一双小脚和一张利嘴，以巧取豪夺的方式来谋求生存。

然而，杨二嫂不是单独一个，而是成群结队出入于“我”将要易主的老屋，“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

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第一卷 509）。鲁迅在叙事过程中并没有明示其内心或愤怒或厌恶的心理，而是以一种零度情感客观地记录整个事件，更像是一位社会观察者或记录者。鲁迅透过杨二嫂们巧言令色和投机巧取的行为，看到的是一群不得不拉下脸面、撇开尊严、剑拔弩张、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为了生存而顽强地抗争苦难的人，他们既可怜又可嫌。

四、“独立本位”思想

在《故乡》的叙事中，存在着多层线性结构，包括童年/少年/成年、过去/现在/将来等几组互相对照的时间结构，而叙事空间则包含了回归故乡与离去故乡的二重结构。鲁迅在时间与空间二重维度中展开了充满矛盾与分裂的思索，对个人的存在意义、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度叩问。《故乡》中蕴含着一种隐喻，它更多地是心灵炼狱的篇章，而非单纯的回忆叙事，“‘故乡’及其童年生活的片段就是这种关于自由的原型心理的闪现，而不是关于故乡童年生活经验的复制”（王学谦 185）。而最能表现鲁迅的这种独立思考精神的当属小说中“我”的形象塑造。

主人公是一位离开故乡二十余年之久的浪子，在异地谋食求生，此番回乡既不是荣归故里，也不是解甲归田，而是“专门为了别他而来的”（第一卷 501）。虽然“我”归乡的意图十分明晰，但仍然免不了带着一份流寓在外之人的憧憬和期待，翘首以盼与心中所魂牵梦萦的故乡再度重逢。然而，迎接“我”的却是萧索的没有一丝活气的荒凉之景，不由心生悲凉：“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第一卷 501）。“我”脑海中的故乡是一个美丽、温暖、亲切的园地，绝不似这般凋敝沉闷。

实际上，鲁迅是作为一个被迫逃异地、做浪子的人，本不容于他的故乡。但作为一个浪迹天涯的人总会有一种天然的乡愁情绪，这便是“思乡的蛊惑”（第二卷 236）。即使记忆中的故乡有美化和提纯的成分，但鲁迅却无法抗拒这种内在的乌托邦，“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第二卷 236）。不仅如此，如果当初离开故乡是为了生计所做的被迫之举，那么当鲁迅满怀温暖地踏上寻根之旅时，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了无根之人。鲁迅之所以耗费笔力去追述灵魂深处的荒凉和孤寂，是因为他“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第三卷 5）。

《故乡》中的“我”怀着一份微薄的希望试图融入故乡，拥抱故乡。“我”对少年闰土的念念不忘，“我”对年轻时“豆腐西施”杨二嫂的真切记忆，“我”对在故乡所度过的童年少年时光的缅怀陶醉等都足以证明“我”对故乡的赤诚情感。然而实际情况是，“我”成了闰土口中的老爷大人，成了杨二嫂掠夺、偷窃的对象，成了一个处处与故乡之人之事不相容的孤独者。诚如王富仁所

言，“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王富仁 31）。

无论是逃异乡还是归故里，鲁迅都没有找到安放灵魂的温柔之地，只是一个悬浮着的无处扎根的游子。这样一种寂寥孤独的处境不仅给鲁迅带来了痛苦，同时也赋予他巨大的自省空间去理性思索人的生存与独立。既然故乡已容不下“我”，故乡之人也与“我”存在着巨大的精神隔膜，那么“我”只有求之于己，学会独立生存，荷载前行。小说中满怀忧患意识的“我”实际上表现了鲁迅对于人“独立本位”问题的思考，也正是在离乡——归乡——再离乡的过程中，“我”完成了与故乡的告别，义无反顾踏上前行的路途。

在封建社会关系中，要想实现人之独立首当其冲便是要洗涤旧的封建思想。以作为空间概念的故乡为例，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方位，而且“是密布着权力关系和价值秩序的社会文化空间。人与空间的关系，人在空间的生存，成为鲁迅故乡话语的着力点”（张春燕 95）。惟有打破旧的思想桎梏，重新开创一个平等、文明、自由的生存空间，才可能实现鲁迅所说的“至人性于全”的人性理想（第一卷 35），因为幸福光明的国度需要仰仗有勇气、有胆魄、有信念、有见地的先觉者去建筑。

对于已深受其害而不能自拔的闰土们和杨二嫂们来说，显然不能够胜任这一重任；而对于踌躇满志的“我”来说，只能是孤独地上下求索，虽不能够指出必胜的路径，但却持之以恒地践行“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第一卷 68），“始终行走在打破囚禁和寻找立足之地的路上”（张春燕 99），以永恒的行走和寻路的方式证实自我的独立存在。最终，鲁迅将民族复兴之重任交到了后起的、崭新的、充满生机与朝气的年轻一辈，他们是鲜活的、赤诚的、可塑的。鲁迅要求觉悟的为人长者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第一卷 135），这是其“立人”伦理观和启蒙思想的又一次宣誓。

聂珍钊认为：

文学伦理学批评带有阐释批评的特点，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独特方法对文学中各种社会生活现象进行客观的伦理分析、归纳和总结，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好坏和善恶评价。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批评家能够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而不是在远离历史现场的假自治环境 (false autonomy situation) 里评价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0）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故乡》进行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尝试，从而较为深入地阐释了鲁迅的“立人”伦理观。可以说，“立人”伦理观与启蒙思想相结合，彰显了鲁迅“兼济天下、强国救民”的伦理思想，达到如鲁迅所言：“国

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即建，乃始雄历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第一卷 57）。唯有人活成真正人的样子，捍卫了人的尊严和理想，才有希望建造一个属于人的国家，进而整个民族才会达到空前的凝聚与团结，由是才可获得抵御外族侵略凌辱的、自强不息的斯巴达之魂。

Works Cited

鲁迅：《鲁迅全集》第 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1-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16-24。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Methods of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4):16-24.]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12-22.]

王富仁：“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语文教学通讯》4（2000）：28-34。

[Wang Furen. “The Lost of the Spiritual ‘Hometown’-An Appreciation of Lu Xun’s *HOMETOWN*”. *Bulleti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4(2000):28-34.]

王学谦：“鲁迅《故乡》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1999）：182-89。

[Wang Xueqian. “A New Discussion about Lu Xun’s *Hometow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2 (1999):182-189.]

张春燕：“鲁迅小说话语建构中的空间焦虑与故乡生命力场”，《江西社会科学》5（2015）：94-100。

[Zhang Chunyan. “Spatial Anxiety and Hometown Vitality Field i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Lu Xun’s Novel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5 (2015): 94-100.]